

文化与传播研究丛书

# 文化想象与人文批评

——市场逻辑下的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研究

傅 泽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科建设成果资助出版项目

文化与传播研究丛书

# 文化想象与人文批评

## ——市场逻辑下的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研究

傅 泽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想象与人文批评：市场逻辑下的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研究 / 傅泽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6  
ISBN 978 - 7 - 81085 - 951 - 6

I. 文… II. 傅… III. 大众文化—研究—中国 IV. G24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0767 号

## 文化想象与人文批评

——市场逻辑下的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研究

---

著 者 傅 泽  
责任编辑 李水仙  
封面设计 源大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 曹 辉  
出 版 人 蔡 翔

---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话：86 - 10 - 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

印 刷 北京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9. 875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 - 7 - 81085 - 951 - 6/K · 951 定 价：28. 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 目 录

绪论 文化想象与人文批评:大众生存经验的思想审视 / 1

第一章 文化发展环境:文化转型与面向世界 / 8

第一节 矛盾中前行:文化现代化的延宕与错位 / 11

第二节 中心化情结:社会进化中的焦躁与迷茫 / 26

第三节 全球化挑战:文化交往中的对话与整合 / 38

第四节 鲁迅的视点:文化的汉唐气魄与拿来主义 / 56

第二章 大众文化理论:正本清源与理论梳理 / 72

第一节 名实之辨:泛化的文化与大众文化变色 / 79

第二节 精英批判:利维斯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 / 93

第三节 文化主义:伯明翰学派的开放视野与双重聚焦 / 115

第四节 多元表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想象与批评美学 / 135

第三章 大众文化发展:世俗化冲击与本土化批评 / 153

第一节 世俗化冲击:后革命氛围中的市场逻辑 / 158

第二节	审美生活化:泛审美时代里的快感体验 / 173
第三节	后现代气质:无厘头电影的造反与自由 / 196
第四节	广告性政治:两性不平等的暴力与强化 / 208
<b>第四章</b>	<b>文化产业战略:核心竞争力与文化领导权 / 226</b>
第一节	文化产业:文化经济转向与世贸规则整合 / 230
第二节	文化竞争:文化大省建设与文化体制改革 / 250
第三节	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核心与文化创新意识 / 266
第四节	文化制导:信息公信培育与文化道统重建 / 286
	<b>主要参考文献 / 303</b>
	<b>后记 / 312</b>

## 绪 论

# 文化想象与人文批评： 大众生存经验的思想审视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转向确定以后，中国社会逐渐摆脱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战争心态，并最终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改革开放的社会调整格局。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孕育已久的中国大众文化在现行体制的默许及市场逻辑的笼罩下迅速崛起，取代了传统精英文化的支配地位和美学趣味，并由高科技与现代传媒的强力支持而独霸了最大的市场份额，影响着最广大的城镇市民。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文化政策；姑且不论此政策的综合社会效果，其对夺取和巩固政权有极大作用是确凿无疑的。但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一轮的整体转型，市场经济开始确立的同时，而文化政策却并未及时地全面转型，二者之间由此产生了严重的不匹配。探讨文化发展的新特点，确定新的文化政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里迫切需要解决好的问题；同时，市场逻辑对文化发展的传统理念形成了巨大冲击，精英文化世俗化、人文文化边缘化、大众文化主流化、公共文化娱乐化，文化想象的支点与凭借也从文字印刷转向了影像多媒体，这些新动态都亟需研究以应变。从这个层面上讲，本选题应该是具有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的。

大众文化研究肇始于西欧，雏形见于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利维斯派”的文学研究，成形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

论;20世纪50年代末兴起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和其后后现代主义诸派文化理论,丰富和开拓了当代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实践,继而影响世界,使文化研究和大众文化批评迅速普及于许多国家,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成为当前世界上最活跃的理论领域。西方有影响的文化理论与批评话语主要有:第一,以阿多尔诺、本雅明、霍克海姆、洛文塔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以霍加特、霍尔、威廉斯、汤林森、莫勒、霍布森、威利斯、费斯克为代表的英国“伯明翰学派”;第三,以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阿尔都塞、葛兰西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第四,以福柯、摩德丝吉、安戈、莱德威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文化思想;第五,以詹姆士、鲍德利亚、利奥塔、贝尔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它们的先后引进,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也能解决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至今仍是我们建构中国大众文化理论所必须汲取的话语资源。但也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或把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硬性移植到中国而变成“假想敌”。

近20年,大众文化如洪水般蔓延全国,它们不仅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成为亿万人形成自己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许多敏锐的学者如邹广文、衣俊卿、叶朗、胡惠林、刘中树、贺立华、李翔海、周宪、李陀、陈刚、戴锦华、陶东风、金元浦、高小康、王一川、王晓明等在大众文化批评和理论引进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然而,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中仍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在对“大众文化”这一基本概念未加科学界定的情况下纷纷炮制话题,如有些论者不作任何甄别便将流行文化、通俗文化、娱乐文化、市民文化、消费文化、商品文化等作为大众文化的同质或等值概念来径直使用,造成概念术语的不统一和理论的混乱,致使大众文化的批评难以深入、有效地进行。另外一些并发问题是:第一,大众文化批评时常以表达方式上的主观随意性来冒充理论命题的原创性;第二,以思维方式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来炫示文化观念的前卫性;第三,以价值判断标准的失范而妄称思想的多元性

和开放性。除此之外,国内的大众文化研究多偏重于杂乱的个别现象评说和浅层次的理论介绍,缺乏明晰的批评立场及系统深入的理论整合与语境转换,更鲜有发展眼光与实践视野,尤其是大众文化发展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源断续问题、大众文化的美学支点与影像时代的审美意义、大众文化审美化过程中的日常性与现代性的融通即大众文化的在世性与神性追求的双赢问题、泛文化语境中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悖反等问题。

中国的大众文化发展,必然涉及到内外两种文化发展因素和中西两种文化批评环境。本书试图探讨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外在顺势和内在动因,为中国大众文化的良性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与实践策略。全书共分四章,立足于中国特定的文化情境,围绕大众文化发展本身及其相关问题从四个层面展开讨论,试图从文化发展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文化批评的国内语境和国外语境出发,探索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之路:

首先是文化发展语境研究,试图将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问题纳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坐标内考察,剖析 19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文化在艰难的现代转型中面临的矛盾与困境,探讨了中心化情节的民族文化心理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影响,尤其是救亡与富强主题下的赶超运动所体现出的焦灼与反复,提出在全面开放的文化交往与对话中实现创造性的文化整合才是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必由之路,对泛文化语境中文化的全球性与本土性的悖反问题也有涉及。

其次是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在正本清源的思路下,系统梳理出文化、大众及大众文化的时代内涵与文化泛化背景下大众文化批评的西方视域,详细剖析了以利维斯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精英立场的文化批判、以伯明翰学派与美国品位文化理论为代表的平民立场的文化主义批评以及以意识形态分析和“葛兰西转向”为根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流派,描画出西方理论话语对中国本土性话语建设的有益影响及潜在危险。

再次是大众文化发展研究,剖析了世俗化冲击对以意识形态斗争为核心理念的中国政党的革命伦理与革命实践的祛魅与促转,探



讨论了大众文化发展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源断续问题以及大众文化的美学支点与影像时代的审美意义,试图确立明晰的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立场;进行系统、深入的理论整合与语境转换,为中国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与本土化建设提供理论和策略上的支持,对大众文化审美化过程中的日常性与现代性的融通即大众文化在世性与神性追求的双赢问题、中国大众文化良性发展的价值标尺等问题也有涉及。另外,选取了当代中国最典型的一些文化个案,以民间精神为出发点,采用现象还原的方式,着重剖析其文化意义和社会趣味以及大众文化本身的复杂性。

最后是中国文化产业研究,对以大众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产业尤其是现代传媒产业的发展定位问题、全球化形势下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的中国文化个性与加入世贸后中国文化产业的应对问题、迅猛发展的社会转型动因和市场逻辑冲力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文化领导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系统、深入的研究中,笔者认为:

第一,各种形式的文化中心主义和专制主义是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绊脚石,全面调整文化斗争心态,彻底放弃思想“一统”观念,以宪政国家法制化规范市场的思路,及早并尽最大可能地释放现代大众传媒的潜能,积极推动高科技的市场转化(包括军工技术的民用化),努力提高文化产品的人文精神含量,实现文化的多元发展和共同繁荣。

第二,大众文化的崛起是在前所未有的高科技合成和现代传播技术的强力支持下,基于新型的编码—解码的文化信息理论,在当今泛审美时代的核心思想——体验论美学和审美日常性理念的支撑下形成的,其美学新视点是视觉转向,其主要文化形态是高品质的、总带有虚拟性的甚至能以技术之“真”淘汰生活之“真”的影像文化。人们借助它们对抗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压力、技术控制和文化霸权,以泛文化倾向力图实现新型的审美解放和意义创造。

第三,现阶段的大众文化批评是在未对“大众文化”进行准确定义而热衷于复述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理论话语的情

况下匆匆出场的,忽略了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问题情境和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阶段,未曾将西方理论话语进行有效的转换和再语境化,由此造成了大众文化批评的五大误区:迟到的批评(理论言说与文化现实错位)、复述性批评(不顾中西方历史文化语境的差异而一味地照搬西方文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自言自语的批评(除了得到暂时的言说快感外,最终没能解决转型时期中国的任何现实文化问题)、无理论的批评(缺乏系统有效的理论范式)、无主调的批评(在众声喧哗的思想阵地上,除了一片狼藉的文化碎片,几乎别无长物)。

第四,中国大众文化的本土性建设必须依赖三个条件:一是向中国传统文化文本(最具本土性特征的文化样品)寻找参证;二是在西方文化及世界文化视野中寻找反证;三是依托中国现代化的宏观背景,尤其要继承“五四精神”和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成果,在文化现代化的现实语境中探讨大众文化的发展问题。正视本土性,实质上就是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坚守文化的“和而不同”与多元主义,维护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不坠。

第五,只有大众文化品位的不断提升与人文内涵的不断丰富以及市场规则的不断完善与操作技巧的迅速提高,大众文化才能既“卖座”又“叫好”。

笔者试图在理论方面确认以下几条:第一,大众文化发展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后革命氛围中在市场逻辑支配下崛起的文化类型,是未来消费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第二,大众文化是建立在活生生的经验型人生定位和动态的体验论美学基础上的,其价值取向是适生性、多元化和快乐原则。第三,既要警惕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又要警惕文化保守主义对抗现代化的一面,充分发挥中国现代化的“后发优势”,走出一条既将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转换,又能超越西方式现代性弊端的文化创新之路。第四,作为文化产业的大众文化是一种新型的“文化经济”,其属性是消费性文化;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彻底抛弃以前单一的文化意识形态观念,确立文化是一种新的经济资源,文化能够转化为先进生产

力的理念。第五,作为未来社会价值理念的主要载体,大众文化良性发展的价值标尺是“后人文立场”与“新理性精神”;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大众文化必须采取“执两用中”的策略与“和而不同”的原则,彻底抛弃那种“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陈旧模式,在古今中外的多种文化资源之间形成高度辩证的联结。

理论创新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的,本书在综合运用文化人类学与现象学的“现象还原”方法的基础上,期望在现实实践中取得以下实际应用价值:第一,为新世纪的价值重建做一点探索。第二,为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中国尚处劣势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一些应变对策,以最终解决外来强势文化冲击下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立性与文化生态平衡问题。第三,为中国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批评话语空间。一般来说,作者着手进行每项研究的初衷总是良好的,至于研究的最终成果是否良好,作者只能说是尽力而为;但笔者期望能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大众文化发展提供一些自己的浅见和思路。

从最宽泛的角度说,任何关于文化的解说与阐释都是文化占有者的一种有关大众经验世界的想象的结果,而任何一部文化史就是一部大众生存经验的想象史。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克利福特指出:“文化,一个集体的想象,是个体自身和自由的土壤。”<sup>①</sup>后殖民论也普遍认为,文化是一种认同想象,这种认同想象在自我建构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从一般意义上说,关于文化的想象历来是知识精英的专利和政治精英的运营,却很少有平民知识者的发言空间和思想遗存,更遑论一般大众了。声言代表大众经验历史的知识权力者和政治权力者编制的所谓“正史”和传统,往往是颂扬自己和遮蔽苦难的谎言册;反抗权力压迫和文化独裁的民间精神虽然一直涌动在古往今来无数血性士子的心中,但是公然的激烈对抗总

<sup>①</sup> [美]詹姆斯·克利福特:《论人类学的自我形成:康拉德与马林诺夫斯基》,见张京媛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

是被打成“思想异端”和“文化叛逆”而遭到镇压。

新时期的大众文化,虽然主要是在高科技支持和市场逻辑的畅行下崛起的,但是它却有意无意间替代了以前总被官方排挤的民间文化的一部分作用,其衍生和传播中完全有可能承袭反叛与解放的“民间精神”,体现一种彻底的民主意识和平等思想。因此,在现代启蒙还相当薄弱,封建专制思想依然顽固的中国当代社会,我们既要警惕大众文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弱化思想的“社会水泥”效应,更要结合中国现实,重点推动大众文化的人文化和民间化,以此完成彻底摆脱封建专制主义阴魂的艰巨任务,真正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所以,当代中国文化人没有太多的理由亦步亦趋地追随早已完成现代化使命转而进入后现代社会的西方理论家的脚步。对作为新知识和新思想的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我们有必要了解和掌握,但是决不要不作历史分析地照搬甚至炫耀。20世纪80年代重新起步的中国大众文化,已经为新时期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祛魅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人性解放和破除专制默默工作着,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世纪开放和民主的时代,由坚定执著的人文批评引领的中国大众文化一定会把真正的大众生存经验传达出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化!

## 第一章

# 文化发展环境：文化转型与面向世界

“中国”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时代的演进，其内涵也在不断发展。在先秦，它指京师，与“四方”对应；或指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地区，与落后的“四夷”对应。相传尧舜投“四罪”于四裔，于是有了蛮夷戎狄。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到，由于共工、驩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夷；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隋唐以降，“中国”指定都于中原的王朝。元代自称其统治区域为“中国”，邻国（如日本、高丽等）为“外夷”。总之，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其核心在一个“中”字，这既是地理学上的中心意识，更是文化上的中心情结。

与此相应，还有一个与“中国”相近的词：“中华”。“华”一说指“华夏”，“华”又指文化繁盛，“中华”意谓居于中心的富于文化的民族。明代朱元璋把“中华”用于政治领域，起兵时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清末，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同盟会纲领的“民族主义”中，借用了这一口号，只是将“胡虏”改成了“鞑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关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征，体现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和伦理纲常。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可概括为四个互相关联

系的方面:理性精神、自由精神、求实精神和应变精神。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尊祖亲、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人文主义,表现为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将做人放在首位。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自强不息、坚持正义、追求真理、贵和持中、民为邦本和平均平等思想,是求是务实、豁达乐观的精神和以道制欲。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从产生之日起,历经五千年而未中断消亡,可以说是一个奇迹。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有其形成和发展的特定背景和土壤。中国的封建社会持久稳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其典型的经济基础,封建的宗法伦理制度是维护其统治的牢固纽带,影响和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进程。虽然历经了无数王朝的变更,但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框架却未曾触动。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认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可以富国强兵,保证社会的稳定。“仓廩实而知礼节”,孔孟儒学向人们灌输的也是重农抑商的意识,主张“知足者常乐”、“安贫乐道”,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养成了因循保守、不思进取的思想与安于现状的惰性。由于这对于统治者的统治是有利的,因而他们也大力提倡这样的思想观念,确保了自然经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的存在和发展。

以冯天瑜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这几个方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属大陆性文化,以农业文明为特征。从地理环境来看,中国东临大海,西北是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纵贯边陲的横断山脉,形成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内部构成完整体系的地理单元。从经济上看,中国文化植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生活的土壤中,在近代商品经济充分发育之前,中国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从社会组织看,中国社会的结构很长时期是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与此相应,则是专制政体的长期持续。“宗法一专制”社会结构与农业自然经济相辅相

成,造成一种以“内圣外王”为目标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型。<sup>①</sup>

尽管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内部潜藏着深刻的矛盾,但传统价值观念支配下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思想体系乃至思维模式自秦汉至近代,两千年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整体结构变化,这也就是著名学者金观涛先生总结出的中国特色“超稳定结构”。历代封建统治者构筑起来的全部上层建筑牢不可破,再生力惊人的强大。尽管一次次的农民起义曾经一次次打碎旧的王朝统治,但重建的新王朝在本质上仍旧同被推翻的王朝别无二致。中国古代的革命一次又一次地把铲除昏君、贪官作为目标,但根本上从来就无损于“王朝”一根毫毛。

中国史籍中有二十四史那样的浩瀚文献,似乎革命也经历过二十四回了。其实不然,历史上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朝代的兴衰、政治的风云,丝毫不能改变王朝的性质。旧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朝代更替的自我循环模式。就连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李自成等人在夺取政权后也不知道有别的选择,只能穿上皇袍,当上了他们从前与之为敌的皇帝。这样,中国的封建皇帝一个个地被打倒,但中国的封建制度却纹丝不动甚至更加巩固。“抽了水掘煤,掘出煤来抽水”——这是鲁迅描写过的一个失败的煤矿,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凄凉的无效循环的文学意象,无效的循环正是中国历史的象征性写照。谭嗣同在《仁学》中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中国有政变而无变政也。”一次次改朝换代,一次次治乱循环,却一直没有实质上的重大进步。一切都回到原点,好像只是绕了一个圆圈;没有变化,只有重复。

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然而,这种动荡不安与其说根源于军事危机的存在,不如说根源于文化危机的存在。文化危机的存在,使近代中国

<sup>①</sup> 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纲》,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人注定不能躺在前人提供的思想安乐椅上无忧无虑地酣睡。鸦片战争是东方古老刀矛与西方近代炮舰的拼杀,是落后农业帝国与新兴工业王国的较量,更是中西价值观念的碰撞。鸦片战争的炮声彻底击碎了中国人价值观念中根深蒂固的民族自豪感,也宣告了一个历史新时代的到来。鸦片战争暴露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一直潜藏着的内在矛盾,从而使得中国历史提出了发展和改造传统价值观念的要求,这便有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型。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的那样:“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否拯救旧文化,而是旧文化能否拯救我们。……中国除了现代化之外,别无他途。这个‘现代化’是她被迫作出的选择。”<sup>①</sup>然而,这种文化的发展和改造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传统价值观念毕竟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强大对手。事实上,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型一开始就遇到了重重阻力和障碍,只能在二律背反的矛盾冲突中痛苦地前行。

## 第一节 矛盾中前行:文化现代化的延宕与错位

自秦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起,汉民族的文化一直处在较高水平,为周边各少数民族所倾心羡慕;即使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最终往往被汉文化所同化。这种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观念和中心辐射型的文化传播方式,导致一种民族自大心理和文化的自我封闭倾向。清政府自雍正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才以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文化面临着新的挑战。

16世纪前后,西方国家由于采取积极鼓励航海贸易、开拓海外殖民市场的拓海政策,并采取了限制输入、奖励输出的保护措施,出现了竞相向海外发展航海贸易的历史趋势。而此时的中国却推行的是极力限制海外贸易、剿灭私人海上贸易的禁海政策。两种政策

<sup>①</sup> 林语堂:《中国人》(全译本),易坤译,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342~343页。



产生两种结果：西方各国开辟了新航路，发现了新大陆，完成了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大大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西方与世界连成一片；而中国却只能是缓慢地爬行在“中世纪”，延续它那早已老朽了的小农经济模式，继续做着那“天朝上国”的好梦，变得与世界越来越隔绝。一边是狂飙乍起，卷着呼啸的海浪拍打着近代社会的大门；一边是晚风轻拂，吹起粼粼湖波与夕阳交映成古代文明的余晖。所以，在19世纪中叶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画卷：西方工业革命全面展开，中国手工业生产步履维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确立，中国专制统治急剧衰落；西方科学技术普遍繁荣，中国科学技术日益萎缩。中国虽然拥有一个足以夸耀于世界的历史传统和成熟的社会体制，但却未能与西方同步跨入近代的门坎，反而成了落伍者。

明清之际，当西方列强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凯歌行进的时候，中国还自负地保持着它那封建王朝的至尊地位，其典型表现就是1793年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勋爵所显示的“集体孤独症”。<sup>①</sup>英国使臣来华的目的在于谋求在华商务利益，进行资本主义近代扩张，为英国贸易在中国开辟新港口、新市场。但使团一踏上帝国的土地便碰上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筑就的坚固壁垒，严峻的冲突发生在要不要三跪九叩上。马戛尔尼拒绝下跪当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礼节问题。中国人强调“严夷夏之防”，自居“上国”，要英国自居外藩下国；而英国使节以为中英平等，没有以“贡使”身份行“三跪九叩首”礼之理。这样自诩上国之主的乾隆在英使身上得不到期待的声威满足，就在英使匆匆“觐见”之后催令他起程回国。在这一回合中双方可谓不欢而散。叩不开帝王之门的马戛尔尼只好一无所获地离开了中国，而觐见礼仪的争执以及叩击帝国之门的隆隆响声，则成了西方世界向满清王朝体制即将发起挑战的最初信号。马戛尔尼使团失败，主要缘于乾隆帝拒绝用平等态度与外国政

① [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26～330页。